

## 傳播為和平之推手： 論傳播學對和平研究之貢獻

葉德蘭\*

### 《摘要》

和平研究為一跨領域新興學門，然於其初起之際，政治學、社會學及心理學等學者在針對「建構和平」或「維持和平」之觀察解析中，即已發現傳播往往成為其中決定性之關鍵。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傳播學界即已著手研究戰爭與和平相關之語藝；1960年代末期開始，和平教育逐漸進入歐美教育體系，傳播溝通能力訓練亦為其重要一環。本文回顧傳播學界近年就和平議題所作之研究，包括和平運動、和平教育、戰爭論述、衝突管理及中介傳播等，並討論傳播於「建構和平」或「維持和平」之價值觀體現過程中，不可或缺之重要性。

關鍵詞：傳播、溝通、語藝、和平研究、衝突、戰爭

---

\*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E-mail: theresay@ntu.edu.tw

## 壹、前言

「和平不在沙漠綻放。」這是古羅馬史家 Tacitus 於羅馬帝國末期戰亂頻仍之際所發出的肺腑之言。的確，和平的締造及維持，需要多方的條件配合，方能實現。和平研究作為以和平為研究對象之學門，主要在探討和平、暴力、戰爭等人類現象之本質、定義、型態和價值觀，以及達成並維護和平的各類途徑與方法，而其研究與發展，實得益於其他諸多學門之貢獻。於和平研究此一跨領域性質的新興學門初起之際，許多政治學、法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等領域之學者，有鑑於兩次世界大戰所付出之慘痛代價，並基於對人類群體前途的關切，紛紛投入相關議題之研究，使得和平研究得以蓬勃發展。

近代和平研究的歷史並不太長，而大部份之發展皆與重大戰爭息息相關，以至於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和平研究的重點多在戰爭而非和平 (Dugan, 1989)。誠然，美國第一個和平研究課程成立於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sup>(1)</sup>，而七〇年代和平研究之所以普受重視亦與備受爭議之越戰有關 (Roach, 1993)。無怪乎和平研究初起之際，多見來自政治學、國際關係研究等學者之論述，而其內容主要在探討戰爭的原因、本質，以及終止戰爭之途徑。此一偏重，於晚近廣受採用的和平研究入門課程教科書中，仍清晰可見。以 Barash 及 Webel 剛出版的教科書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為例，全書五百餘頁，其中戰爭相關議題所佔篇幅即達三分之二以上<sup>(2)</sup>。

以止戰為鵠的的負面和平(negative peace)固然非常重要，隨著和平研究學界對正面和平(positive peace)、結構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與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的日漸重視，相關研究者在「止戰」的宏觀角度之外，也開始注意到更微細之處。這些學者多半來自應用社會科學(applied social science)等類學門，研究方法以實證分析歸納為主，而其

對社會實際情形的觀察解析顯示，傳播在實踐和平的各個層面中，實扮演著重要角色：無論是在人際關係、群體互動，或是國際協商的層次，雙邊或多邊傳播溝通之成功與否，往往是成功地「建構和平」(peace-building)與「維持和平」(peace-keeping)的關鍵；無論是在國際關係的層面或是在各級課程的設計之中，衝突之處理或合作互助之促進皆有賴於傳播溝通技巧與協商策略。由是之故，七〇年代以降的和平研究與和平教育文獻中，傳播溝通導向的衝突化解相關論述之比重明顯地大幅增加。於此同時，為推動正面和平，而不僅止於化解衝突與戰爭，學者對於暴力之分析也更為深刻。在 Galtung 對暴力的分類中，增加了「文化暴力」，係指社會文化價值觀中，用以間接支持結構暴力並使其合理化或合法化的符碼或觀念(Galtung, 1995)。一般大眾或能察覺言語辱罵、肢體毆打等直接暴力，或能辨識違反社會公義及基本人權之法規制度等結構暴力，然而對更深層符碼所代表之文化暴力往往習而不察，而語藝(rhetoric)之分析適可發現符碼底層之文化暴力觀念，從而探討消除此類暴力之途徑。

和平研究學界與傳播學界正式注意到彼此之相互關聯是在八〇年代末期、九〇年代初期。在 1991 年的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和平研究的主要學術刊物之一) 中，有文章提出應改善美蘇傳播溝通之管道以促進和平(Ball, 1991)。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在 1988 年即以「傳播與和平」作為年會主題。Media Development 期刊亦於 1983 年出版專刊 “Communication and Peace”。其後，傳播學界最大之學會組織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現已改名為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亦成立專責研究小組(Peace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來探討傳播與和平之相關議題(Troester & Mester, 1990)。

由上觀之，傳播學界似乎相當晚近才積極參與和平研究。事實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初，便有許多傳播及語藝學者即已著手探討和平與戰爭相關之語藝(rhetoric)及宣傳手法。例如傳播學者常使用的傳播定義之一：「誰對誰說了什麼並有什麼效果」(Who says what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就是 1926 年 Harold Lasswell 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盟國宣傳手法的論文“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中所用的定義。而傳統上專研公共領域之傳播論述的語藝學者，也發現此類論述攸關和/戰政策之訂定，以及大眾對和/戰的接受程度。自 1960 年代末期開始，和平教育逐漸進入歐美教育體系，傳播溝通能力訓練成爲課程中之一環，而化解衝突的技巧尤其受到重視。近年來隨著大眾傳播媒體之成熟與科技發展，和平與暴力、戰爭得以更具體、更迅速、更詳盡地再現 (represented) 於世人面前，而和平之建構與維持，也深受資訊快速傳播之影響。目前傳播學界對於和平的研究，即主要集中於上列語藝分析、人際傳播、中介傳播等三個傳播次領域當中。本文回顧傳播學於此三個次領域所作之和平相關議題研究，根據學界關注各個次領域和平議題之時間先後次序大致分爲三部份，包括早期即多有著力的戰爭與和平運動論述之語藝建構及分析，1960 年代末期開始漸受重視的人際傳播模式及策略對實現和平之影響，以及隨著科技進步，在中介傳播 (mediated communication) 情境中，影視、網路等傳播媒體特性對於推動和平所造成的阻力與助力，藉此使讀者了解傳播學者在各個次領域逐漸與和平研究產生關連之發展情形，並進而探討傳播及傳播學界於體現和平文化價值觀的過程中不可或缺之重要性。

## 貳、和戰政治論述之語藝分析

英文之 rhetoric 一字，經常被譯爲「空談」、「高調」，而非「語藝」。此字的確帶給人不少負面的聯想，例如：只長一張嘴、光說不練、或刻意修飾安排卻空洞無實的語言。許多報章文章標題中也多用 rhetoric 偏負面的意涵，特別當論及戰亂地區時，和平常和 rhetoric 聯結，來和現實的戰爭作對比<sup>(3)</sup>，或指和平只是不實的口惠<sup>(4)</sup>。事實上，語藝在西方文化傳統中的發展歷史長遠，且自古希臘羅馬時期發軔以來，歷代大師

輩出，其原因在於語藝實為人類文明發展中重要之一環，展現著人類使用象徵以達到傳播目的之行動過程。人際間透過語言相互影響也是語藝的作用之一。在研究對群體影響深遠的公共論述時，語藝成爲一種了解論述現象的模式，其分析應處理論述發展之動機、形式、過程的面向(Bryant, 1978)。本節整理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傳播學者對戰爭與和平相關之公共論述所作之語藝分析，舉其要者，以說明使用語言論述可以影響公共決策與輿論走向之事實。

### 一、戰爭論述 (The War Rhetoric)

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牽累之廣、傷亡之眾，使得二十世紀中之語藝學者多重戰爭論述之分析研究。經由實際語料之收集整理，可歸納出國家領導人或意見領袖，在戰爭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之語藝策略。以下先就戰爭未起、戰爭當中，及停戰以後等三個階段來說明。

遠在實質戰爭尚未開打之前，語藝傳播就要先爲大眾作心理準備。此時支持開戰的論述，會以直接、具體，而情感強烈的言辭來吸引公眾關注此一議題，並提供各種理由使其接受開戰之必然性及迫切性。若要進而激起大眾意願，能將自家子弟送上戰場，則更需經常有高分貝的公開言論，且不時重覆己方之正當性及對方之過患。語藝學家 Kenneth Burke 分析德國希特勒之戰前言論，堪稱此類研究之經典。在希特勒攻打奧地利之前，他先不斷直呼維也納(Vienna)爲巴比倫(Babylon)，利用聯想(associative merger)手法，從而將維也納意象化爲基督教聖經所載之充滿貧窮、娼妓、亂倫、謀殺，道德淪喪的城市，使得德國出兵入侵他國成爲替天行道、除奸拔惡之義舉(Burke, 1941)。

此一富於宗教色彩的論述，可回溯至中世紀基督宗教所謂的「聖戰」(just war)觀念及英勇戰士爲聖人的作法(Cohen & Menache, 1986; Gilligan, 1990)。這種在宗教經典中找尋合理攻擊對方的原因，試圖以宗教爲戰爭背書的論述，至今仍爲啓戰國所喜用。

戰爭時期之美國總統言論亦以類似手法來凝聚國內對參戰之共

識，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威爾遜、羅斯福、杜魯門總統，皆將對方描述為奸黠狡詐而又絕不理性的敵人，並強調其對國際安全及人類價值之蠻橫威脅已使得和平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可行途徑。這些論述的確贏得了美國國內民眾對參戰的支持(Ivie, 1982; Dorsey, 1996)。他們也經常把敵人的行動視為恐怖份子之恣意攻擊，以強化敵人非理性、非文明的本質與形象，而聲稱美國不得不為體現於美國立國精神及其價值觀中之人類文明的存續而戰(Cherwitz, 1978)。

這種醜化、妖魔化對方的語藝論述，一旦正式開戰之後，便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戰事發展之說明，以告知大眾敵我進退傷亡之最新情況。此時不見強有力的意象譬喻，亦少情緒性的語詞，甚至往往使用非常隱諱的言語來敘述己方傷亡。Boyton 與 Beer 分析美國國會外交聽證會之言論，發現當談到美國傷亡時，只用“casualty suffered”或“lost”等詞語帶過，而對於對方所遭到的重擊，則以鮮明意象及細節加之以清楚的說明，以申述己方軍事行動之有效性(Boyton & Beer, 1996, p. 14)。

戰事臨近尾聲之際，亦有較高語藝密度之公共論述，來為停戰作心理建設。開戰之時所提出之理由，無論如何堂堂正正、振振有辭，此時都要先暫放一邊，以停止繼續激發敵意，並逐漸消除大眾之對立心態。除宣稱戰略目標已經達成之外，通常會訴諸雙方共通之道德標準或價值觀。例如兩伊戰爭末期，伊斯蘭兄弟情誼(Islam brotherhood)即成為當時伊拉克國內論述之主流聲音(Beer, 2001)。

語藝運用在開戰、停戰等戰爭論述(the war rhetoric)中，凝塑了公眾所認識的參戰理由及戰爭形貌此外，在西方戰爭論述中，採用軍事行動之一方，多經由論述譬喻，自比為冒險故事或運動比賽之英雄，於危機時刻力挽狂瀾；或是將戰爭耗費之物力、人力喻為一項報酬率高之投資，最終必有所得。數年前的科索夫(Kosovo)戰爭中，英美即採用這種比喻(metaphor)來自況。這樣的比喻手法，結合理性思維與想像空間，粉飾了殘酷的戰爭現實而將之轉化為人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活動(Kuusisto, 2002)。

在五〇到六〇年代的所謂「冷戰」時期(the Cold War)，美蘇兩大集團對峙之際，語藝對長期心理戰爭(psychological warfare)之維持，更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冷戰時期雖無大規模之實質戰事，但美國作為「鐵幕」(the Iron Curtain)外之領導國家，仍持續戰爭論述的語藝用法。根據多位傳播學者之研究，冷戰論述之修辭手法包括：

1. 絕對名詞(absolute terminology)：如上帝、民生、進步、真理；
2. 兩極對立(stark polarization)：如誠實 vs. 謊言，民主 vs. 共產；
3. 恐懼訴求(fear appeals)：如秘密警察、勞改營、處決；
4. 死亡意象(death image)：如在死亡邊緣掙扎、失去美國立國精神；
5. 敵人之暴行(savagery of the enemy)：如共產專政、蠻橫挑釁；
6. 美國之正義(righteousness of America)：如合作、公平原則，以人類福祉、和平願景為重；
7. 自由之脆弱(fragility of freedom)：如人類自由或自由政府(free government)即將不保，我們所篤信之生活方式會被摧毀；
8. 基督教用語(Christianity association)：如信心、犧牲、毒蛇、十字軍聖戰(crusade)。

(Cherwitz, 1978; Graebner, 2000; Medhurst, 1997a, 1997b; Holloway, 1994; Parray-Giles, 1994)

傳播學界對戰爭論述之語藝分析，顯示了言語論述乃為一強有力之工具，領導者可藉以傳達和平抑或戰爭之意圖，並且內可動員本國人民，外可進行宣傳、尋求國際支持(Beer, 2001)。主事者果決、公義、昂然不屈的強力態勢，及其簡單、絕對、直接的論述，斷除了戰爭外的其他可能解決方案。相較之下，謹慎將事之呼聲、多層面多角度之思維觀點、以及重視和諧協商之論述，常被視為無知、懦弱、與鄉愿。後者之論述亦常遭到刻意地忽視，甚至會被冠以「不愛國」之惡名(Kuusisto, 2002)。由相關語藝分析角度繼續觀察戰爭及和平論述之發展方向以及其形塑集體心態之影響力，確為關心人類和平的傳播學者之一大任務。

## 二、和平運動論述

面對政府主事者強勢的戰爭論述，以及鼓勵敵對心態的意圖，倡導和平人士在非暴力之各種行動方式之外，亦試圖由語言論述來影響輿論和大眾對和平/戰爭的態度。本節探討近年傳播學者針對和平運動運用的語言、符碼，以及對國家安全論述之挑戰所作的研究結果，及其對和平研究之貢獻。

當代和平研究先驅之一的 Galtung 很早即注意到言詞語意 (semantics) 與推動和平之關係。他發現在英語中，與和平相關的詞彙多半以負面的字詞結構出現。對大部份人而言，和平的意涵就是「沒有暴力」，而非「暴力就是沒有和平」。英語中「非」的負面表意字首“non-”與“dis-”也出現在許多和平論述中必須時時用到的字彙上，例如“non-violence”「非暴力」、「non-military」「非軍事」、「disarmament」「廢武」、「civil disobedience(non-cooperation)」「不合作反抗運動」。在華語文字中，也有類同的情形。Galtung 質疑：如果 non-violence 是正面的、積極的、主動的解決衝突的方式，為何語言會以非常態的、異類的、負面的或消極的標示(marker)來呈現此一觀念呢？語言乃反映文化之符碼，因此他建議要改用更為正面、積極的語詞來指稱和平相關之行動及觀念，例如「不合作」(non-cooperation)策略可改稱為「自主」(autonomy)策略，以突顯「和平生活方式之選擇，才是真正獨立自主、勇於負責的作法」(Galtung, 1987)。

同樣注意到語言意涵深入人心的社會改革運動者 Norman Thomas 也試圖藉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影響，來重新闡釋戰爭的意義及其底層之道德觀。語藝學者 Whedbee 分析 Thomas 四〇年代之重要演講，發現 Thomas 成功地將“victory”「勝利」之意義演譯為毀滅及死亡之相等詞，從而轉化大眾之動機並導之趨向和平。Thomas 認為，戰爭的試金石並非打敗德國、日本，而是要超越自己想找代罪羔羊的逃避傾向，同時誠實地面對國內政治、經濟、族群的問題，而不致因為短暫的軍事或政治



利益而便宜行事，犧牲了美國立國憲法的真義(Whedbee, 2001)。

和平論述並不僅止於檢討傳統戰爭論述與主流文化語言之意涵價值；相對於維護國家安全或自由民主制度等訴求，和平運動者以科學及現實之證據（如歷史上化干戈為玉帛之危機處理的成功案例），加上道德論點（如龐大的軍事費用與微薄的濟貧福利支出之不成比例）來說明戰爭之非必要性與毀滅性(Rojecki, 1999; Schultz, 1997; Stephenson, 1989)。而和平論述若能影響和戰之決策，多半是由於和平運動者對於戰爭傷亡所造成的殘酷面與戰爭結束後對社會經濟之衝擊所作之公共論述，經由媒體之披露報導，使得輿論轉向於支持以和平方式化解衝突，而非開戰。

除了論述語言以外，和平運動亦透過其他形式的語藝來倡導和平與非暴力，如團體聯署聲明、旗幟標語之招貼、示威抗議、行動劇、歌曲、祈禱、或展覽等(Sharp, 1972; Gorsevski, 2000)。基本上，這些非暴力的運動形式，皆屬說服性質的傳播活動，其目的均在於勸說大眾在衝突中減低甚而放棄暴力之使用，在彼此非暴力式的對話中增進相互了解，並促進社會公義及平權之實踐。而在語藝論述運用之當下，即是消除實質的暴力行為，而使實現和平的可能性大為增加。由此足見語藝論述乃「真正的非暴力行動」(“true nonviolent action”)(Gorsevski, 2000: 452)而應廣為推動和平人士所使用，方符合「以和平手段達成和平」(peace by peaceful means)之運動前提。

若真能以此運動前提來進行檢視，便可發現，在某些和平運動所提出之口號及策略中，實存在著語藝上的弔詭。著名的和平教育推動學者 Betty Reardon 提醒我們，若非暴力運動及和平論述中使用了戰爭或軍事用語（如「為和平而戰」、「打擊貧窮」、「和平運動的彈藥庫」等等），就等於藉著自己的言詞選擇去認同甚至禮敬戰爭系統之標準(Reardon, 1989)。在運動策略方面，Ginsberg(1980)分析了多項和平運動之語藝形式，而提出警告：若我們以血腥事實來威嚇大眾，或是造成大眾對某些政策產生憤怒而激烈的情緒，和平運動者亦無異於好戰份子，因為二者

皆使用非和平的語藝策略以求達成目的。這些與和平傳播及語藝相關的反省及研究，反映了戰爭文化深入人心，難以徹底拔除的結構性影響，即使在以和平為職志者之溝通行為上，亦不難見到痕跡，因此，倘若真欲「以和平手段達成和平」，傳播學者在此相關議題之研究發現，確實可提供和平運動者及和平倡導者非常有價值的參考，從而觀察檢討和平論述與和平運動，如何在透過溝通傳播而推動和平的同時，實踐和平與非暴力。

### 參、人際傳播與和平實踐

口語傳播(speech communication)乃人類傳情達意、敘事說理的工具；人類互動之各個層面皆賴之方得以進行，而和諧和平則是人類在各層面互動之理想境界。然而和平並非一穩定不變動的狀態，而是藉由彼此不斷地溝通、交換資訊、增進了解、建立情誼與聯結，以構築和諧的互動關係；因此，傳播溝通實是表現和平並持續建構和平的方式。傳播學界認識到傳播對於和平建構的重要性，故而自七〇年代起，即著重衝突化解與管理以及非暴力傳播之研究；八〇年代中期，進而開始關注傳播在武器管理與決策過程中之影響；九〇年代以後，國際事務協商談判中的溝通因素逐漸在外交、貿易等領域受到重視(Burns & Aspeslagh, 1996; Korzenny & Ting-Toomy, 1990)。本節整理近年口語傳播理論模式在人際互動之各個層面對實踐和平的貢獻之相關研究。

#### 一、人際互動層面

個人與個人互動之日常情境中，傳播學文獻最著者，首推衝突化解與管理(conflict resolution and management)及和平式溝通法(peaceful mode of communication)。前者可使人在歧見、衝突發生之始，即審慎處理，以維持人際和諧、防止暴力行為產生；後者乃建議平時即以積極

性的參與溝通來增進彼此了解、合作的程度，減低衝突發生之可能性。二者皆在個人生活層面作用來維持人際和諧關係，減低衝突與暴力，從而奠定和平社會與和平文化的基石，以消弭暴戾之氣於無形。

傳播學者早已觀察到，人們在衝突發生時之舉止行徑，多半一成不變，不會隨著情境調整，因此時採用不適當之行為模式，加深衝突之程度，故而了解自己並觀察對方慣常使用之模式，實為衝突化解之首要工夫，亦為傳播學者研究之一大重點。Kilman 與 Thomas(1997)，及其後一派研究者分析出五大衝突處理模式：競爭的(competitive)、折衷的(compromising)、閃避的(avoiding)、委屈求全的(accommodating)及協力的(collaborating)。此五種模式各有優缺點，也各有適合使用之情境，在處理衝突、維持人際關係時可提供極有價值的參考，可幫助人們適時適地做出最好的溝通選擇，並針對自己個人特質修長補短。此一分析模式亦多為其後衝突管理訓練所採用(Berryman-Fink & Brummer, 1987; Canary & Cody, 1994)。

七〇年代，隨著和平教育之興起，人際互動中的衝突化解與管理開始進入社區及學校之課程。此類課程提供傳播溝通技巧及策略，以求化解人際衝突；其內容包括如何察知意氣用事的溝通表現，如何將其導向理性、溫和之傳播溝通模式，如何使用問題解決步驟及技巧來進行仲裁、協商，如何以非暴力的溝通方式來化解家庭中、學校裡、職場上之紛爭衝突等(Filley, 1975; Hocker & Wilmot, 1978; Priscilla et al., 1977)。此一著重人際傳播之和平教育方式，八〇年代後因家庭暴力及學校暴力日趨嚴重而逐漸進入學校正規課程(Caulfield, 2000; Lincoln, 2001; Keashly & Waters, 2002; Stomfay-Stitz, 1993)。許多和平教育課程皆由傳播學者與教育專家共同設計，其中廣受中小學校採用的教科書有 *Peace Is in Our Hands*(Abrams & Schmidt, 1973), *Creative Conflict Solving*(Schmidt & Friedman, 1983), *Fighting Fear*(Schmidt & Friedman, 1986)，以及 *Peacemakers*(Shapiro, 1996)。此類衝突處理技巧訓練之課程實施後，追蹤研究多顯示其成效相當卓著，例如，在有些美國大城市之中等

學校教授 Peacemakers 之後，學生因語言或肢體暴力行為而受罰的比例降低了 40%，而因該類行為而遭停學處分的比例更降低了 67%(Pascopella, 2002)。在戰火威脅下的地區（如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推行衝突管理的技巧，效果亦佳，且參加訓練者能進而對以和平而非戰爭方式來解決大規模衝突（如中東問題）的主張產生信心(Day & Farhood, 1985)。

除關注傳播技巧在衝突管理上之運用外，傳播學界也探討溝通過程中之各面向對衝突後果之影響及改善之可能方向。在透過溝通對話來了解歧異，化解衝突之人際互動方式中，以雙邊或多邊談判協商(negotiation)以及由第三者居中調停的衝突調解(mediation)最為口語傳播學者所關注。由分析、研究、談判、協商實際案例中，學者發現，輸贏兩方所常用之溝通模式，確有不同(Donohue, 1981)。若談判程序規則不夠周延，參與各方過去皆有相當程度之關係歷史(relational history)，且談判內容攸關自身利害權益，但兩造目標各不相同時，往往會當場使用威脅語(Donohue & Diez, 1985)。如此，以攻擊回應攻擊(attack-attack)或自衛回應自衛(defend-defend)的溝通方式來談判，往往無法獲致實質成果而徒勞無功(Putnam & Jones, 1982)。在各持己見的情況下，做為第三者的調解人(mediator)若能與談判各方保持適當距離，力求自己立場前後一貫，在溝通時得以組織彙通各方意見，重述而不加演繹，要求雙方深入解釋並適時提供其他觀點，則仍有相當可能促使談判有結果而化解衝突(Burrell, Donohue, & Allen, 1990; Donohue, Allen & Burrell, 1988; Hocker & Wilmot, 1995; Manusov, Cody, Donohue, & Zappa, 1994)。此外，有各方直接溝通的管道、明確表達自己需求與未來計劃、使用正面涵義之語詞、尋求共同之目標、以及表達善意之肢體訊號，皆有助於降低衝突或使衝突產生正向的結果（此方面研究的綜合整理，可參見 Canary & Cody, 1994; Verderber & Verderber, 1996; Deutsh, 1973; Hocker & Wilmot, 1995）。

除了看重衝突發生時的處理技巧，傳播學界也明確指出傳播溝通是

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是以近年來學者最為著力處，乃在倡導改變日常根本傳播溝通之模式。從研究導致衝突之溝通模式中發現，對立、競爭式的溝通最容易傷害彼此而造成口語的衝突及排擠壓迫的行為(Jacob, 2000)；若此一溝通模式持續不變，則不良的溝通便會快速惡化為肢體衝突(Gorsevski, 1998; Hocker & Wilmot, 1995; Summy, 1998)。至於如何使溝通互動具有說服力並產生實質的影響來改變現況，學者建議以邀請參與之溝通模式(invitational model of communication)及合作式論證(cooperative argumentation)來取代原本常見之對立、競爭的溝通方式。邀請參與之溝通模式，係指溝通時，以增進了解為目標，以平權公正為基本原則，相信人人皆有表達自己意見之權利，而不強加個人價值觀於對方，並透過雙向互動之表達與傾聽來創造出共同認可的意義空間，體認相互依存之關係，從而產生對解決問題之共識(Foss & Griffin, 1995)。合作式論證，則在鼓勵雙方(或多方)體認多元存在之必然性，並視彼此為襄助資源(而非競爭分配同一資源之對手)，主動積極地與對方以合作共享的模式來面對歧異產生之根源(而非僅僅汲汲於衝突之最終輸贏)，並以此態度為理性論證溝通的前提，來處理歧異，降低衝突發生的可能(Makau, 1990, 1998; Putnam, 2001; Putnam & Geist, 1985; Summy, 1998)。

傳播學界對於衝突發生時的處理技巧以及日常根本溝通模式之研究成果，固然已經進入和平教育或衝突管理訓練之中，然和平教育者多視之為技能層面之訓練，並沒有納入傳播學界日漸重視之情意層面及建構認同之傳播功能。這樣不完整的移植，無法讓傳播發揮其最大功能，殊為可惜。另一方面，如只重技能策略之應用，而疏於關照傳播底層認知架構(frame of reference)，會讓和平溝通模式無法深植，其效自然有限。因此傳播學界可在協助和平教育規劃及執行方面，更加重技能策略之外的考量，並強調其重要性及對溝通結果之影響。有鑒於人際或跨文化傳播學者在公眾或國際事務層面耕耘時間不長，又多以達成負面和平之策略分析為主要研究範圍，傳播學界未來可多朝向攸關正面和平之

「結構暴力」與「文化暴力」之傳播來探討，例如傳播如何具現或增強這些阻礙實現和平的社會、經濟等因素，並將之納入實際從事國際事務協商人士之養成教育之中。

## 二、公眾國際事務層面

目前和平教育所推重的傳播模式，不但為聯合國採用為推展和平文化(culture of peace)之重要基礎之一(UNESCO, 1993)，亦在實證研究中得到支持。Blake(1998)觀察非洲諸國在國界談判時，和平的傳播方式仍然非常有效，並且其使用者能受到與會者的高度肯定與尊重，更能對其他人產生正面的影響。事實上，在族群或國際協商或談判的過程中，溝通的技巧與策略能夠大幅度地影響談判的結果。如 Fish 及 Ury 於 1981 年出版的 *Getting to Say Yes* 被譽為談判聖經，並且一直到最近都被列為談判訓練課程之必讀經典作品。該書中大量運用各種說服傳播技巧來達到己方目的，同時尚能兼顧對方需求。又者，傳播學者研究談判實例中使用的論證方式而發現，個人傳播技巧的高下，會影響談判者彼此間的人際關係(Fall, 1994)，也會影響談判的結局是戰、是和(Watson & Haines, 1996)。學者故而建議外交官及商務談判代表皆需要此方面溝通技巧及策略運用之訓練，以使談判協商達成更具建設性的成果。

一般而言，傳播學界將外交、跨國談判等溝通層面歸類於跨文化傳播之範疇。各方談判代表若能先對彼此文化背景產生的不同傳播特質有所了解，可以減少誤會，並收事半功倍之效(Cohen, 1997; Walker, 1990)。跨文化傳播學者多將世界上文化區分為高網絡敏感/低網絡敏感(high-context/low-context)、個人需求為重/集體需求為重(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等類別。研究顯示，高網絡敏感與集體需求為重的文化較注重長遠人際關係之建立，並傾向先以原則來論理，而非先舉出特定人、事、時、地、物之細節為證明(Gudykunst & Kim, 1997)。亞裔的傳播學者 Ting-Toomey 認為顏面維持(face-honoring)與威脅(face-threatening)是談判各方皆應積極運用的策略。她分析了 1962 年古

巴飛彈危機期間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傳播發現，赫魯雪夫致甘迺迪的兩封立場強硬、措詞嚴厲的信，被美方視作為了維持顏面之表現，而非刻意挑釁或企圖立即開戰。基於此了解，美方採取冷處理，並為俄方製造挽回顏面之機會，危機因而不致升高，而此一國際衝突也終於和平解決(Ting-Toomy & Cole, 1990)。聯合國「傳播與意識提昇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Communication and Consciousness Raising, 1996)在「國際和平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舉行之學術會議上，力倡國際協商應著重於工業化國家與非工業化國家關注議題及傳播模式（特別是情緒性反應之表現與肢體訊息）之異同，以增進國際談判之成效。

## 肆、傳播媒體與網際網路對和平 / 戰爭之影響

隨著科技之發達進步，人類日趨倚賴中介傳播媒體，如視聽媒體與網際網路，來了解世界各地的現況、交換資訊意見。自然二者對於和平之建立維持或戰爭之預防與報導，也愈來愈具有影響力。本節整理傳播學者對此方面之研究，並著重於媒體與網路對推展和平之實質貢獻與潛在功能。

### 一、傳播媒體

關注媒體運作而重於批判理論的傳播學者大多認為，現代媒體已與政、工、商、軍形成共生結構而泰半成爲主流政治之發聲工具。例如八〇年代的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由於其董事會成員投資核武生產，該報所刊載之言論，便偏向贊同核子武器備戰之主張；而廣島日人受核害之悲慘照片，也直到拍攝十五年後才得以出現於電視上(Nelson, 1987; Roach, 1993)。又，基於新聞價值之高下利害，媒體對戰爭報導之興趣，也遠遠超過爲和平所作努力之報導(Shinar, 2000)。傳播

學者分析，媒體報導戰爭時，多由主流觀點來觀察戰爭發展，與政府同調；或多認同中產階級、愛國觀念，而著重於敵方之損失與己方之英雄作為(Carruthers, 1999; Rojecki, 1999)。如是僅僅反映西方文化與經濟利益的觀點，常將負面的刻板印象加諸於第三世界國家，再加上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媒體在全球新聞傳播上佔有壓倒性的優勢(Nordenstreng & Varis, 1974)，其報導方式往往流於狹隘偏頗，而遠非致力於提供客觀訊息以增加國際間之彼此了解，更遑論於促成國際社區的和平(Roach, 1990)。無怪乎許多和平運動者視傳播媒體為國際和平之阻礙。誠如 Becker(1982)所言：「只有大眾傳播媒體真正的民主化」，不再任由西方工業化國家宰制，媒體才能真正地對社會及國際和平之締造有所貢獻(p. 227)。

大眾傳播媒體雖然偏愛報導戰爭相關新聞，但不時也會注意到以和平為目標的政治運作，只不過常被批評為流於公式化或甚至帶有嘲諷意味的報導(Bruck, 1999; Mosco, 1999)。Shinar 分析了傳媒所報導之中東與北愛爾蘭之和談(Peace Talk)新聞，發現三個論述特質：

1. 和平進展仍由戰爭論述及用語來詮釋，例如報紙談到中東西岸地區之以巴合作時，引述領導者的軍事論述 (military discourse)：「我們的巴勒斯坦夥伴會與我們共同打擊恐怖份子，必將殺人者繩之以法。」<sup>(5)</sup>

2. 將和談報導瑣碎化、八卦化，以至於模糊了真正的焦點。例如強調以巴領導人一年沒說過話了，在和談前夕卻互遞古巴雪茄<sup>(6)</sup>，或以色列外交部長說他拒絕去握阿拉法特的手<sup>(7)</sup>。

3. 將和談程序儀式化，缺乏具創意的報導角度，而其內容與使用之言詞均已僵化、了無新意，例如必用「由戰而和」、「化敵為友」等字眼，或聲稱在最後一分鐘必有破局的可能、危機也必得到解決，之後還要加上公眾意見調查數據為輔(Shinar, 2000)。

在新聞傳播方面，亦有政府試圖控制大眾傳媒來影響國際談判之走向及結果，如眾所矚目的七日戰爭後的以阿和談，Wolfsfeld(1997)分析



了當時以色列總理拉賓主導之奧斯陸(Oslo)和談新聞報導。初期其國內媒體保有相當程度之獨立自主，其後甚至出現反對以色列主張而多有負面報導，但 Wolfsfeld 發現拉賓政府最後仍然控制了新聞資訊之呈現，而媒體則喪失了獨立主導性。此一轉變亦有助於以色列在和談中，採取強硬姿態而終獲優勢。

媒體對於發自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和平運動之報導，也在深度、廣度上加以簡化，報導時間或報導篇幅更短；通常以訪問運動領導人為主，但又不讓受訪者充分表達其對和平之想法或運動之訴求(Mosco, 1999; Rojecki, 1999; Shinar, 2000)。與軍事報導及戰爭正當化論述的幅度相比，更深化了反戰和平訴求的歧異性，甚至還加強了倡導戰爭一派主張的可信度(McCormack, 1989)，但愈來愈多的和平運動者，了解到大眾傳媒對於推展和平實有無遠弗屆的效果。因此他們日漸重視如何與傳播從事人員連結，以求得到公眾民意的支持，並可藉此廣為傳播，匯集更多志同道合人士之努力(Carter, 1992)。這樣的媒體報導手法及論述，適足以突顯出傳媒對於和平議題的新聞價值所作的假設(由於和平議題的新聞價值不高，故須添加細節以吸引閱聽大眾)，而該手法的持續運用，也代表著傳播學界對於大眾傳播媒體的批判仍未發生多大作用。

## 二、網際網路

多為西方意識型態所壟斷的傳播媒體，已慢慢失色於新崛起的傳播與意見傳播管道——網際網路(the Internet)。雖然網際網路的建立，實發軔於美國國防部基於核戰通訊考慮所架設之傳播網路，但現今網路的速度、便利，及其無國界的全球社區化之特質，使得具有相同理念之各國人士，得以不受地域、距離之限制，而能快速地相互傳播、凝聚共識，發揮更大的影響力(Speicher, 2001)。此一促成全球跨國傳播的科技革命，實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且勢將發展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要傳播媒介。網際網路對戰爭與和平的影響，正方興未艾，故而已成為許多傳播學者目前最為關注的研究議題(Meeks, 1998; Gromley, 1999; Stross,

2001)。

因網際網路之發展漸趨成熟，和平運動人士及傳播學界皆對之寄予厚望，認為將可打破文化、國家之藩籬，結合全球各地人民（特別是年輕人），而締造「電腦輔助和平」(computer-aided peace)(Stross, 2001: 47)，或是「網路世界和平」(world peace through the Internet)(Nicholas Negroponte, cited in Meeks, 1998)。他們希望藉由訊息快速流通，意見管道公開普及且民主化的網路傳播，衝突能夠迅速化解。曾有多位學者觀察分析墨西哥之 Zapatista 解放軍在被困七年之後，利用網站而得以在國際社區中發聲、揭露當地軍事暴行及人權迫害，進而尋求國際支持而迫使當權者與之對話(Cleaver, 1998; Holloway & Pelaez, 1998; Russell, 2001)。正如 Castell(1997)所預言的，經由網路，一切現實均透過言語符號傳達，也就是說，現實由網上傳播建構而成。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反地雷運動」(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即透過網路與全球上千個組織與熱心人士聯結而促成了國際反雷草約之擬訂，而這一切都由該組織領導人 Jody Williams 家中一部連接上網的電腦開始。這是前所未曾想見過的和平推動方式——數位傳播實已開啓了和平運動的新頁。隨著網路科技之普及，將會有更多人士在網路上發聲、交換資訊、合作、抗議、彼此幫助，以求促進和平。台灣和平促進基金會的P事網即為一例。

網際網路雖然有助於和平之推展，然其上也充斥著各國、各政黨之政治宣傳與不實之資訊，而恐怖份子藉由網路互通氣息之說<sup>(8)</sup>，也時有所聞(Gromley, 1999)。然而網路最大之隱憂，乃在於資源的分配不均，以及國家對外來資訊之審查與箝制(censorship)(Ardila, 2001; Stross, 2001)。網際網路若能形成任何「智識社區」(intellectual community)，必須先有最低程度的經濟發展與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才談得上使用電腦上網。目前世界上能使用網際網路的人口，絕大部份集中在工業化國家。根據網路通訊之行銷顧問公司 Global Reach 在 2000 年所作的統計，網路語言以英文居首(47.6%)，其次為日文(9.6%)、中文(7.6%)、德文

(5.5%)及西班牙文(5.2%)，可見非英語人士要能在網上有效發聲或搜尋資料，必須使用英文，因此外語教育也成為使用網路的基本要求之一。目前世界上仍有為數不少的地區人民無法達到這些要求，故而藉由網路傳播來推展和平的想法，恐難免仍有窒礙難行之處。何況，世界上有些國家對網際網路限制甚多，諸如封殺特定網頁、監控聊天室(chat room)、破壞敵對國家或異議團體之網站，這對冀望由網路之傳播聯結而促進自由平權的和平運動人士來說，不免要大失所望。或許由於網際網路乃新興現象，傳播學者在此方面的實例研究，特別是長期觀察分析，甚為缺乏，然有鑑於此一媒介強大之傳播功能，希望對此一領域有興趣之學者繼續探索數位傳播對於戰爭及和平的影響。

## 伍、結語

在和平研究中，各個次領域的研究方法及重點，容或不一，然而向有學者主張和平乃為全面性、整體性之觀念，應遍及人類活動之各層面：由個人內在認知思考及反應方式開始，至人際、家庭、社區、國家等範圍之互動，甚而廣至國際以及全世界的和平，皆彼此有所關連、相互影響；和平研究無法僅囿於國際政治角力之探討或衝突戰爭之消弭。由此可知，在人類文明與文化各個層次中所建構發展出的，與和平相關之知識、策略、價值觀等等，皆有助於建構多面一體之和平(Castro, 1999; Mattelart, 1994; Reardon, 1989)。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傳播在歐洲（後在美洲）被譽為「文明之推手」(agent of civilization)，其原因正在於傳播普遍深入人類互動之各個層面，實為交換資訊、意見，建立文明的重要工具。和平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理想之一，自然也必須倚賴傳播方能實現，而不致成為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樓。是以，傳播對於和平之實踐與體現，不可或缺。本文回顧整理近年來傳播學界研究和平相關議題的文獻，發現無論在論述語藝方

面、衝突管理與談判溝通方面，抑或傳媒網路方面，傳播對建構全方位和平之意義與影響，皆歷歷可見，而傳播學對於切入和平過程各層面之研究，亦可與和平研究相互發現參考。和平研究與傳播學關係之密切，實不下於其他社會科學學門；二者結合之緊密，在和平實踐與和平教育之層面，尤為顯著，而事實上，傳播學界在這些次領域中也最有貢獻，其研究成果多集中於戰爭論述及個人層面的人際溝通範疇之中，以追求負面和平之協商談判及衝突化解為主。

在提倡正面和平的努力方面，傳播學界之重要貢獻首推和平傳播模式之建構：傳播學者所建議之「邀請參與之溝通模式」及「合作式論證」皆極有助於實踐和平文化。然而，人際傳播中極為重要的說服(persuasion)、非口語傳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以及小團體運作(small group dynamics)等研究課題，目前尚未得納入促進正面和平的相關研究之中，仍需相關學者投注心力，期使增強和平傳播模式之效益，讓人人皆樂於採用。又者，在論述語藝方面，針對本土結構暴力、文化暴力之符碼分析，以及海峽兩岸倡言和平人士之政治修辭之探討，尚不多見，亦為傳播學者可繼續研究的方向之一，以善盡學者監督、反思、批判之責，提醒大眾對各種形式之暴力危患有所警覺，並鼓勵和平傳播模式與符碼之使用。

在和平研究領域當中，許多學者尚未認識到傳播對於推展和平之重要性，而僅以人際技能策略率爾視之，此實乃和平運動之一大損失。由傳播行為建構現實的觀念來看，和平之建構，必得經由傳播溝通方能體現；即便和平研究已發現不少可以促進和平之因素，但如未能經由傳播呈現，亦將流於理論或理想。如和平學者(Weiss, 2000)觀察北愛爾蘭及南非進行之和談和解，發現族群衝突的化解必須建立在長期發展的信任感上，不過卻沒有提出發展彼此信任感之途徑。這正是人際傳播及公共傳播學者可以著力之處：針對透過政策宣示及實際操縱執行之傳播而建立互信機制之過程做研究，並進而協助或監督該過程。換言之，和平研究的分析觀察結果，還需要傳播學界的轉化與落實，方不致流於高調或

被移植利用以遂行其他非和平意圖。

有鑑於此，如何透過媒體輿論的力量，將和平、人權、正義、全球視野等的訊息傳佈於社會大眾，設法將和平理念轉化成社會的普世價值，並一點一滴地把無法一蹴可及的和平理念落實到溝通互動的生活層面之中，不但是有心推動和平文化理想者之目標，也是傳播學最能發揮所長之處。和平研究在近年來由負面和平逐漸轉向正面和平為主之研究趨勢下，傳播於體現和平文化價值觀的過程中不可或缺之重要性也逐漸顯露。此正意味著傳播學在和平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將會越來越明確，也將會是對實現和平文化理想最有貢獻的學術領域。相信此一「和平之推手」的角色將為傳播學界所樂見，並且是我們未來共同努力的方向之一。



## 註釋

- (1) 此課程最初設置於 1948 年，地點在印第安那州北部之 Manchester College。
- (2) Barash, D. P., & Webel, C. P. (2002).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3) Sri Lanka: Rhetoric of peace, reality of War, by S. Sathananthan (1997). Association of Tamils of Eelam and Sri Lanka in the U.S.
- (4) 關於當今以巴間動盪情勢，不少學者直指以色列在西岸(the West Bank)打著和平口號的旗幟，實際上卻行鎮壓、增墾之獨斷統治 (Carey, 2000; Gordon, 2002)。
- (5) Jerusalem Post, October 25, 1998.
- (6) Jerusalem Post, October 9, 1998.
- (7) Jerusalem Post, October 21, 1998.
- (8) 曾在 1996 年劫持日本大使館人員作為人質的 The Peruvian Tupac Amaru 很早即在網際網路上設站，並以德文、西班牙文、英文、日文、義大利文、及挪威文提供資訊，相當受歡迎。

## 參考書目

- Abrams, G. C., & Shmidt, F. C. (1983). *Peace is in our hands*. Miami: Grace Contrino Abrams Pe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 Ardila, R. (2001).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eace.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7*, 191-192.
- Ball, D. (1991). Improving communications links between Moscow and Washingt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8*, 243-262.
- Becker, J. (1982). Communication and peace: Th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wo categories in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 227-240.
- Beer, F. A. (2001). *Meanings of war and peace*.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 Berryman-Finck, C., & Brunner, C. C. (1987). The effects of sex of source and target o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s. *Southern Speech Communication Journal, 33*, 38-48.
- Blake, C. (1998). The role of peace communicat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28*, 219-231.
- Boynnton, G. R., & Beer, F. A. (1996). Talking about dying: Rhetorical phases of the peace/war policy cycle. Unpublished paper.
- Bruck, P., with Roach, C. (1993). Dealing with readability: The news media and the promotion of peace. In C. Roach (Ed.),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war and peace*. (pp. 71-96). Newbury Park, CA: Sage.
- Bryant, D. C. (1978).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D. M. Burks (Ed.), *Rhetoric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n exploration*. (pp. 176-188).
- Burke, K. (1941). The rhetoric of Hilter's "Battle". In K. Burk,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 (pp. 191-220).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urns, R. J., & Aspeslagh, R. (1996). *Three decades of peace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 anthology*. New York: Garland.
- Burrell, N., Donohue, W. A., & Allen, M. (1990). The impact of desputants'

- expectations on mediation: Testing an interventionist model.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7, 104-139.
- Canary, D. J., & Cody, M. J., (1994).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 goal-based approa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arey, R. (Ed.). (2001). *The new intifada: Resisting Israel's apartheid*. Westminister, UK: Verso Books.
- Carruthers, S. L. (1999). *The media at war: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arter, A. (1992). *Peace movements: Internal protest and world politics since 1845*. New York: Longman.
- 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Castro, L. (1999). Peace education as a pathway to peace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Peace Forum*, 15(27), 83-97.
- Caulfield, S. L. (2000). Creating peaceable school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7, 170-185.
- Cherwitz, R. A. (1978). Lyndon Johnson and the "crisis" of Tonkin Gulf: A president's justification of war.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1, 93-104.
- Cleaver, H. (January, 23, 1998). The Zapatista Effect: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an alternative political fabric. [Online]:  
<http://www.eco.utexas.edu/Homepages/Faculty/Cleaver/anti-hell-man.htm>
- Cohen, E., & Menache, S. (1986). Holy wars and sainted warriors: Christian war propaganda in the Middle Ag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 (2), 52-62.
- Cohen, R. (1997). *Negotiation Across Cultu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DC: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 Day, R. C., Abdennur, A., & Farhood, L. (1986). *The effect of war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Lebanese*. Beirut: 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Day, R. C., Malarkey, J. M., Farhood, L., & Abdennur, A. (1985). Towar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a civil war setting: A communication workshop for students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3*, 306-307.
- Deutsch, M. (1973). *The resolution of conflict: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processes*. New Haven, CO: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onohue, W. A. (1981a). Analyzing negotiation tactics: Development of a negotiation interact system.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7*, 273-387.
- Donohue, W. A. (1981b). Development of a model of rule use in negotiation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48*, 106-120.
- Donohue, W. A. (1990). Interaction goals in negotiation: A critique.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3*, 417-427.
- Donohue, W. A., Allen, M., & Burrell, N. (1988). Mediator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5*, 104-119.
- Donohue, W. A., Diez, M. E. (1985). Directive use in negotiation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2*, 305-318.
- Durgan, M. A. (1989). Peace studies at the graduate level.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4*, 72-79.
- Falls, R. (1994). Argumentative flexibility as a factor in message acceptance. *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 31*, 17-25.
- Filley, A. G. (1975). *Interpersonal conflict resolution*.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 Fisher, R., & Ury, W. (1981). *Getting to yes: Negotiating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 Forcey, L. R. (1989). Introduction to peace studies. In L. R. Forcey (Ed.), *Peace: Meanings, politics, strategies*. (pp. 1-14). New York: Praeger.
- Hocker, J. L. & Wilmot, W. W. (1978). *Interpersonal conflict*. (1st Ed.). Midison, WI: Brown & Benchmark.
- Hocker, J. L. & Wilmot, W. W. (1995). *Interpersonal conflict*. (5th Ed.). Midison, WI: Brown & Benchmark.

- Holloway, R. L. (1994). Keeping the faith: Eisenhower introduces the Hydrogen Age, in EM. J. Medhurst (Ed.). *Eisenhower's war of words: Rhetoric and leadership*. (pp. 47-72).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Galtung, J. (1987). Language and war: Is there a connection? *Current Research on Peace and Violence*, 10, 2-6.
- Galtung, J. (1995).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in the age of cholera. *Peace & Conflict Studies*, 2, 6-17.
- Gilligan, J. J. (1990). Teaching peace in a Christian context. In Leroy S. Rouner (Ed.), *Celebrating peace* (pp. 15-32).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Ginsberg, R. (1980). The rhetorical dilemma of pacifism. *Peace & Change*, 6, 1-6.
- Global Reach. (November, 8, 2000). Statistics. [Online]: <http://www.greach.com/glob-states/index.php3>.
- Gordon, N. (2002). The rhetoric of peace. *The Progressive*, 66 (2), 43-45.
- Gorsevski, E. W. (1998). The physical side of linguistic violence. *Peace Review*, 10, 513-516.
- Gorsevski, E. W. (1999). Nonviolent theory on communic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orizing a nonviolent rhetoric. *Peace & Change*, 24, 445-475.
- Graebner, N. A. (2001). Myth and reality: America's rhetorical Cold War. In M. J. Medhurst, & H. W. Brands (Ed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 Linking rhetoric and history*.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 Gromley, C. (1999, March). Getting wired for peace. *The World Today*, 55 (3), 18-19.
- Gudykunst, W. B., & Kim, Y. Y. (1997). *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3rd Ed.). Noston, MA: McGraw Hill.
- Ivie, R. L. (1982). The metaphor of force in prowar discourse: The case of 1812.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8, 240-253.

- Jacob, J. A. (2000). Communication: Key to peace in doctor groups. *American Medical News*, 43 (10), 17-18.
- Keashly, L., & Waters, W. C. (2002). Working it out: Conflict in interpersonal context. In L. K. Fisk & J. L. Schedlberg (Eds.), *Patterns of conflict, paths to peace* . (pp. 35-61). New York: Broadview Press.
- Kilmann, R. H., & Thomas, K. W. (1997). Developing a forced-choice measure of conflict-handling behavior: The MODE instrument.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7, 309-335.
- Korzenny, F. & Ting-Toomy, S. (Eds.). (1990). *Communicating for peace: Diplomacy and negoti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 Kuusisto, R. (2002). Heroic tale, game, and business deal? Western metaphors in action in Kosovo.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8, 50-68.
- Lincoln, M. G. (2001). Conflict resolution education: A solution for peace. *Communications and the Law*, 23, 29-40.
- Lopez, G. A. (1994). Conceptual models for peace studies programs. In D. C. Thomas & M. T. Klare (Eds.), *Peace and world order studies: A curriculum guide*. (6th Ed.) (pp. 3-13). Boulder, CO: Lynne Rinner.
- Madau, J. M. (1990). Revisioning the argumentation course.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15, 79-91.
- Madau, J. M. (1996). *Notes 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Studies*, 47, 135-141.
- Manusov, V., Cody, M. J., Donohue, W. A., & Zappa, J. (1994). Accounts in child custody mediation session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22, 1-15.
- Mattelart, A. (1994). *Mapping world communication: War, progress,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Cormack, T. (1989). The 1988 Southam Lecture: The texts of war and the discourse of peac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 1-16.
- Medhurst, M. J. (1993). *Dwight D. Eisenhower: Strategic communicato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Medhurst, M. J. (1997a). Atoms for peace and nuclear hegemony: The rhetorical structure of a Cold War campaign. *Arms Forces and Society*, 23, 571-593.
- Medhurst, M. J. (1997b). Eisenhower and the crusade for freedom: The rhetorical origins of a Cold War campaign.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7, 646-661.
- Meeks, B. N. (February 1998). No justice, no peac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41 (2), 17-19.
- Mosco, V. (1993).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war and peace. In Roach C. (Ed.).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war and peace*. (pp. 41-70). Newbury Park, CA: Sage.
- Nelson, J. (1987). *The perfect machine: TV in the nuclear age*.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 Parry-Giles, S. (1994). Rhetorical experimentation and the Cold War, 1947-1953: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ist approach to propagand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0, 448-467.
- Pascopella, A. (2002, May). Conflict Resolution.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2002 (May), 43-45.
- Priscilla, P., Burger, L., Budehamer, G., & Stern, L. (1977). *Children's creative response to conflict*. New York: Quaker Project on Community Conflict.
- Reardon, B. A. (1988). *Comprehensive peace education: Educating for glob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Reardon, B. A. (1989). Toward a paradigm of peace. In L. R. Forcey (Ed.). *Peace: Meanings, politics, strategies*. (pp. 14-25). New York: Praeger.
- Roach, C. (1990). The movement for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A second wav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2, 283-307.
- Roach, C. (1993). (Ed.).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war and peace*. Newbury Park, CA: Sage.

- Rojecki, A. (1999). *Silencing the opposition: Antinuclear Movements and the media in the Col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ussell, A. (2001). The Zapatistas and computer-mediated peace. *Peace Review*, 13(3), 357-363.
- Sharp, G. (1972). 198 methods of nonviolence Action. In J. Fahey, & R. Armstrong (Eds.). *A peace Reader: Essential readings on world order*, (pp. 473-474).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 Shmidt, F. C., & Friedman, A. (1983). *Creative conflict solving for kids*. Miami: Grace Contrino Abrams Pe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 Shmidt, F. C., & Friedman, A. (1986). *Fighting fear: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for Kids*. Miami: Grace Contrino Abrams Pe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 Schultz, S. (1997). The tragic-comic rhetorical "dance" of marginalized groups: The case of Mennonites in the Great War. *The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62, 305-318.
- Shapiro, J. P. (1996). *Peacemakers*. CD-Rom. Bloomington, IN: N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
- Shinar, D. (2000). *Media diplomacy and 'peace talk.'* *Gazette*, 62(2), 83-97.
- Simpson, C. (1994).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eicher, S. (2001). *A web of concern*. *Ecumenical Review*, 52, 216-238.
- Stephenson, C. M. (1989). The evolution of peace studies. In D. C. Thomas & M. T. Klare (Eds.), *Peace and world order studies: A curriculum guide*. (5th Ed.) (pp. 9-19). Boulder, CO: Lynne Rinner.
- Stomfay-stitz, A. (1993). *Peace education in America, 1828-1990*. Metuchen, NJ: The Scarecrow Press.
- Stross, R. E. (2001). A web of peace — or war? *U. S. News & World Report*, 131(22) (November 26), 47.
- Summy, R. (1998). Nonviolent speech. *Peace Review*, 10, 573-578.
- Ting-Toomey, S., & Cole, M. (1990). Intergroup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 A face-negotiation perspective. In F. Korzenny & S. Ting-Toomy (Eds.), *Communicating for peace: Diplomacy and negotiation*. (pp. 57-76). Newbury Park, CA: Sage.
- Troester, R., & Mester, C. S. (1990). Peace communication: A survey of current attitudes, curricula practice,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54, 420-428.
- UNESCO. (1993). Action programme to promote a culture of peace. UNESCO Document (27c/126).
- Verderber, R. F. & Verderber, K. S. (1996). *Inter-Act: Us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Belmont, CA: Wadsworth.
- Watson, R. K., Haines, M. (1996). Effect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rocess variables on outcomes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gotiation simula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6.
- Weiss, R. (2000). *Peace in their time: War and peace in Ireland and South Africa*. London: I. B. Tauris.
- Whedbee, K. (2001). 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 in Norman Thomas's "Some Wrong Roads to Peace."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5, 45-64.
- Willock, R. K., & Slayden, D. (1995). *Hate spee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Wolfsfeld, G. (1997). Fair weather friends: The varying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the Arab-Israeli peace proces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4, 29-48.
- Working Group on Communication and Consciousness Raising, UNESCO. (1996). A global strategy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nsciousness raising in various local settings. In R. J. Burns, & R. Aspeslagh (Eds.). *Three decades of peace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pp. 73-77). New York: Garland.

**Communication as Agent of Peace:  
What Communication Studies Can Do for Peace Studies**

Theresa Der-Lan Yeh\*

**Abstract**

Peace studies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has accrued efforts of scholars from anthropology,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since the 1940's. In their analyses of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processes, communication emerges as a key element leading to decisions of war or peace. In fact,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tended to the use of war rhetoric as early as around the World War I. Yet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communication scholars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recognized in the field of peace studies. This paper reviews rec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peace-related issues in three areas, political rhetoric regarding war and pea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peace education, and mediated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since communication constitutes the very essence of human existenc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realizing peace in the world.

**Keywords: communication, rhetoric, peace, conflict, war**

---

\* Theresa Der-lan Yeh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